

中華學術叢書

刘述先 著 东方朔 编

儒家哲学研究

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儒家哲学研究

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

刘述先 著
东方朔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刘述先著;
东方朔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
(中华学术丛书)

ISBN 978-7-5325-5596-3

I. ①儒… II. ①刘…②东…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495 号

中华学术丛书

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

刘述先 著 东方朔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6 字数 405,000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5596-3

B · 697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右）与编者合影

刘述先(1934—)，江西吉安人，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系文学士、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伊利诺斯大学和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兼任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

作者学贯中西，会通古今，被誉为“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在国际哲学界颇有影响与活力的开放型的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以构建新儒学、弘扬新儒学为己任。

作者一生笔耕不辍，著作有《文学欣赏的灵魂》、《语意学与真理》、《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文化哲学的试探》、《生命情调的抉择》、《中国哲学与现代化》、《马尔劳与中国》、《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文化与哲学的探索》、《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中西哲学论文集》、《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等，编有《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等书。

出版说明

自1991年王永兴先生的《唐勾检制研究》、柳存仁先生的《和风堂文集》与项楚先生的《敦煌文学丛考》出版以来,《中华学术丛书》至今已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已刊与将出的名家研究著作,也已接近二十种,并在海内外学界赢得了高度的赞誉。当前民族文化的复兴已成为国家的文化战略,而学术昌隆,正本清源,更是文化复兴的前提,为此,本社决心花大力气,通过相应的调整,来加强本丛书的出版力度。

《中华学术丛书》定位为海内外汉学界高端论著交流的平台,以及时荟萃一流汉学研究著作为己任。她与集成性整理性质的《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并列,将成为本社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的两个核心品牌。

《中华学术丛书》将不限于原初以传统汉学研究为主的格局;凡学殖丰厚、思理深刻、卓有创见的汉学研究,无论其方法是传统的还是新潮的,其视角是单一学科的还是跨学科的,都将进入编者的视野。

《中华学术丛书》的作者,将由原来以大陆老一辈专家为主,而扩展为朝向一切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她既为名家大师一生著作的集萃,也可以成为中青年俊彦头角初露的温床;她对于大陆、港澳台乃至各国汉学家的优秀著作一视同仁,因此部分汉译著作,也将

适当采纳。

《中华学术丛书》的形式，以专著、专史、专题论集为主，也适当地采用“文存”的形态，如果有既合乎基本学术规范，而形式更有创新的著作，也不妨尝试。

我们感谢已进入本丛书的各位专家的奉献，感谢本丛书各个方面的热诚读者；我们更衷心地期盼与更广大的作者群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好《中华学术丛书》这一知名品牌——为了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编者序

很明显,上一代浸润在传统之内更深,信念也更强,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的成就也还没法子与上一代比肩。但我们这一代都受到现代西方教育的训练,很自然地在方法学上有更大的自觉,受到现代问题与外来的冲击也越大,同时更关注传统与现代接通的大问题。也可以说,如果上一代更着力于传统的护卫,那么我们这一代更用心于传统的转化上。

——引自刘述先《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省》

—

本书选编的是刘述先先生关于儒家思想研究的部分论文。

刘述先先生,祖籍江西吉安,1934年出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学士(1955)、哲学硕士(1958),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1966)。曾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1958—1964)、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1966—198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1—1999)、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1999—2004),现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兼任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刘先生被誉为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著名哲学家与哲学

史家，是在国际哲学界颇有影响与活力的开放型的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①。

二

据说，利亚德(Louise Liard)和田纳理(P. Tannery)在为笛卡尔作传时强调，对于笛卡尔，人们只需记住他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以及他的逝世日期和地点便足够了，因为他的整个思想只是他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粹然显露，而与他个人的生平轶事，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历史事件没有关联。智者的思想，只是智者心灵的显现，不必去穷究他所处的时代和他个人的故事，此一看法自然看似斩截利落，毫无牵扯嚼舌。不过，这样一种观点，不仅不能获得知识社会学的支持，甚至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Richard Rorty)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盖这种看法若放在罗蒂的“镜照”之下，自然免不了会被看作是“一种逃避历史的企图”、“一种去发现任何可能的历史发展的非历史性条件的企图”。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多么玄辨抽象，却总有其特殊的具体的缘由。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笛卡尔有关“确定性”概念的提出，便与其时的宗教战争密切相关；同样，笛卡尔阐发的心、身观念，看似纯粹理性沉思的结果，然而，罗蒂却毫不客气地挑明，“存在于笛卡尔二元论背后的所谓直觉，其实具有一种历史的根源”^②。

当然，所说这些，殊非意味着编者要为刘先生作传。事实上，有关刘先生的生平与学思历程的相关介绍不仅刘先生自己著有自

① 参阅郭齐勇：《刘述先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载李明辉等编：《儒学、文化与宗教——刘述先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页287。

②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页6—7。

传体的《传统与现代的探索》^①一书,而且大陆学者中至少有景海峰教授、姚才刚教授在他们的相关论著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说明^②;同样的,所说这些,也殊非意味着刘先生的思想在编者看来只是其内心世界的独白,相反,我们正正想要指出,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刘先生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斋到书斋的经历,可以说单纯得有点纯粹^③,然而,这样一位书斋学者,其所思、所想所呈现出来的韵律和轨迹,却与民族的、时代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刘先生自谓“萦绕在我少年的心灵不外乎两个中心的问题: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中国未来的前途”^④。其实,站在儒家的立场,所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与中国的前途、文化的前途问题,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盖个人生命之途之安顿和畅达与民族的、文化的生命之途之安顿和畅达,原本便盘错交集在一起。相对于文化的、民族的生命和未来前途而言,个人的生命价值即是要在“自觉地去作一个中国人,存在地去作一个中国人”以护持住儒家之理想外^⑤,积其精思,暗学潜修,以为民族文化之未来开展设想应有的方向和结论,此正刘先生在少年时即发愿,“誓以一生之力,省察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为生命树立一个目标,为文化觅取前途”^⑥。

① 刘述先:《传统与现代的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该书共分六章,从“我的家庭背景”、“在台湾求学的生涯”、“东海六年教书的经验”到“南伊大留学与教学的经历”、“我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上、下)”、“回顾与前瞻”等,较详细地回顾和记录了刘先生自己的学思过程。

② 参阅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编序》,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姚才刚:《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第一章”,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③ 刘先生曾以“夫子自道”的口吻说:“自从一九四九渡过海峡到台湾立志学哲学以来,就一心往这条路上走去。五一年考取台大哲学系,除了大学毕业受了一年军训以外,由当学生到做老师,从来没有一天离开学府,更没有一时一刻脱离我在哲学上的岗位。”参见《传统与现代的探索》页158。

④ 刘述先:《生命情调的抉择·自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页5。

⑤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页328。

⑥ 刘述先:《中西哲学论文集·自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页IV。

然而,话虽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却非易事,“我的出发点是为生命寻求意义,为文化寻求出路,但身当中西文化的冲击,整个民族文化与个体生命均陷入危机之际”^①,如何接受现代化的挑战,如何拨去障隔,扫空格套,破除迷惘,斩断葛藤,以剔精抉髓,阐明心要,即非有转转苦思、精密较量者不能展至大成。我们可以说,刘先生对“超越一内在”说的推进,对儒家宗教意涵的现代阐发,对“理一分殊”的创造性诠释,对“两行之理”的会心与致意,对《易》理既济未济“回环”说的揭橥,对全球伦理、宗教对话的精思与考索,甚至为维护新儒家一体而多元开放的性格而对新儒家内部争论予以超越反省所流露出来的苦心等等,皆可以视之为刘先生站在时代的高度,并面对时代的问题,在对儒家义理予以精思细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回应。毫无疑问,刘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全面和详实地评论此贡献并非本文的任务^②,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前辈,刘先生的新儒学思想的确具有他自身特殊的问题意识,可以被看作是接着第二代新儒家而讲的。有学者已经指出,刘先生的努力方向正在于在肯认熊、牟等前辈超越的心性论系统的理想性追求的前提下,强调和突显理想与现实、“理一”与“分殊”之间的距离与紧张;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峙之外寻觅第三条路;同时通过既尊重内在超越,又尊重外在超越的两行之理的体证,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因而,“就总体而言,可以说刘述先先生的着力之处乃在于对熊、牟哲学下一转语,使之接得上现当代的多元化格

① 刘述先:《传统与现代的探索》,页21。

② 相关研究可以参考前引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编序》,姚才刚:《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及李明辉等编:《儒学、文化与宗教——刘述先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等专书;同时,在一些研究新儒学思想的论著中,学者也多有论及,如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赵德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等。

局。他确实是接着牟先生的哲学讲的,同时也向人们昭示出牟先生所建构的系统已不可能按其本来的面目传下去,从而宣布了一个过程的终结”^①。此处所谓由“牟先生所建构的系统已不可能按其本来的面目传下去”云云乃是一个颇能引人误解的说法,盖严格说来,历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在其思想体系创立之后,其后继者能依样葫芦般地传下去^②,即便在注疏传统中,郑玄之《论语》注与皇侃之《论语》义疏固不相同;但谓刘先生的哲学乃接着牟先生的哲学而讲的,却道出了刘先生自己自觉努力的方向,刘先生自己曾云:“我现在可以明言,在我的系统哲学思想的建构之中,我决不会像牟先生那样借途康德,走逻辑、知识论和批判的道路,来凸显中土三教‘智的直觉’的睿识,更不会像唐君毅先生那样用黑格尔的方式,以三界九境容纳了各种分殊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形式,最后凸显出儒家的天德流行境。”^③盖身处于后现代思潮之冲击,刘先生非常清楚地自觉到“造大系统的宏图,已是过去时代之事。在西方,像黑格尔、斯宾格勒那样的大系统已不可再。同样,当代中国哲学家的综合一样是时代的产物,有其一定的意义与限制,不可东施效颦”^④。故无论在内容、方法或视野上,身处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皆不应固守某种不变的成法,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回应新时代的需要”^⑤。但此所谓“不应固守成法”,又殊非只是“齐是非”、“冥得失”,其确切的含义即是“拒绝相对主义”、“向往超越的

①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30。依我个人的理解,“终结”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句号,其实意毋宁说是一个“总结”,一如西方的康德,后世学者之发展皆可从此流出故也。

② 刘先生的问题意识固有其自己的特点,但他也明确表明自己多得益于牟先生的睿识。即便在被认为是最忠实地护卫牟先生思想的李明辉教授那里,其对牟先生思想的阐发亦有创新与转化。

③ 请参阅氏著:《刘述先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页8。

④ 同上。

⑤ 刘述先:《当代儒学发展之新契机》,载林安梧主编:《当代儒学发展之新契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32。

理一”，企望在一元与多元、绝对与相对之两极的夹击之中，“谋求一条出路”^①。毋庸讳言，此一基本的致思向路不仅构成了刘先生处理儒学与西学关系的原则与方法，事实上，刘先生对儒家思想转型论的提出，对“理一分殊”、“两行之理”的再抉发，对儒学重要问题的再反思，对全球伦理、宗教对话以及海内外各种问题的再三回应，似乎无一不体现着此一原则和方法。

三

人们常常说，做哲学最困难的事情是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但有意义的问题又常常蕴涵在最平常的问题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上世纪初至今约一百年来，儒学似乎并不曾改变其生存状况的尴尬地位。“五四”时期，儒学的这种尴尬乃至被批判和指责主要表现为落后、保守、阻碍现代化等等，而今天儒学的这种尴尬却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为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与要求。尽管学者们于此缠绵固结，甚或不惜以儒学为唯一旗帜以鼓动天下，然而，儒学在今日还远远无法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观念系统似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②。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从哲学上看，一种理论若不能掌握群众，我们似乎只能从理论的自我反省中寻找个中原因，这便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同时也是一个牵涉诸多头

① 刘述先：《刘述先自选集》，页8。

② 刘先生认为：“直至今日为止，无论大陆、台湾，儒学仅占一边缘地位，这是当前我们必须面对的实际情况。”参阅氏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页208。

绪、无法一时理清的问题。不过,就今天的情形看,对儒学的反省似乎主要不是一种技术性的、知识性的工作,而是首先涉及到某种哲学观的建立问题。文德尔班(W. Windelband)曾言:“每个哲学家的世界观的要素产生于永远不变的现实问题,也产生于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性;但除此之外,还产生于他的人民、他的时代的观点和理想。”又说:“我们不难认识到,哲学家经常争辩毫无现实根据的问题,因而耗费精力徒劳无益;另一方面不难认识到,即使关系到解决真正问题时,还不知不觉掺进了于事无益的、想用(先天的)概念结构解决问题的企图,这对问题的解决,非但无益,反而有碍。”^①当然,作为一门批判性的科学,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先天的思辨在其思想系统中的地位,此亦理之易明者。不过,我们今日研究儒学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问题倍出且已经现代化了的世界,而这个已经现代化了的世界对于任何一个儒学研究者来说却首先不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客观认知问题。近代以来,儒家文化陷入困境,我们似乎并不能倒果为因地认为是由于人们对儒家文化丧失了信心,相反,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儒家文化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时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化解困局的能力,亦即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与要求。审如是,则面对当前儒学研究的困境,我们似不能仅仅通过激发信念、梳理文献、搬弄考索而获得出路^②。对于我们今日的儒学研究来说,现代化作为一个改变世界史的运动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在事实上已经构成我们了解儒家文化的平台以及我们作一切主观自觉努

①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24、25。

② 刘先生曾谓:“我既要吸收西方的长处,也要保留传统的慧识,它们在我的思想之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极,而是相互补充的二元……我现在特别注目以高远的理想如何具体落实的问题。”参阅《传统与现代的探索》,页42、43。

力的限制^①。果如是，即如何直面现代化及其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便成了我们今日如何研究儒学的恰当的下手处。明乎此，则我们也就多少可以了解，何以刘先生“不再取传统的立体显用的直观方式”，而是直面新儒家的转型，由流溯源，因时代的演进和问题之出现而揭出儒学发展之“新契机”的深层原委，“我的思想是流走的，不断与时推移，不宜于造论、建构哲学的大系统，在这方面我的精神与解构、非绝对化的时潮是契合的”^②。

当然，单独听此言说，不免会给人以某种零散的、碎片化的印象，甚或会被一顿扯入相对主义的旧轨之中。然而，刘先生于此却有一套系统的观念，且对此却斩截得极为分明，此即相对主义乃至实用主义并不能充当我们今日文化重建的“诺亚方舟”，非但不能，而且还难免会使人迷失方向。不可否认，此一看法正与其念念于对终极价值理想之护持密切相关。“晚近流行的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虽然在肯定不同文化的贡献与生存权上有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过分夸大文化间的差异却不免引起多元主义的隐忧，而为识者所虑。”^③“现代讲多元，却不可以堕入相对主义的陷阱，更不可以放弃对真理的追求。”^④事实上，刘先生再揭“理一分殊”、“两行之理”以及“回环”三个概念^⑤，并给予创造

① 参阅劳思光：《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页 6。

② 刘述先：《刘述先自选集》，页 8。在本“选编”中，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从刘先生的《从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学的历史处境与文化理想》、《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契机》到《论当代新儒家的转型与展望》；从《全球伦理、宗教对话与道德教育》、《儒家哲学在心理学上的意涵》到《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现代的重建》；从《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角度论儒家传统的宗教意涵》、《儒学的理想与实际：近时东亚发展之成就与限制之反省》到《作为世界哲学的儒学：对波士顿儒家的回应》等等，似乎在在皆浸透着一个基本的运思原则和思考主题，那就是刘先生乃紧扣着时代与问题，以言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及其未来开展之方向。

③ 刘述先：《世界伦理与文化差异》，见氏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页 35。

④ 刘述先：《从当代新儒家观点看世界伦理》，见氏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页 75。

⑤ 刘述先：《“理一分殊”的现代解释》、《“两行之理”与安身立命》，皆见氏著：《理想与现实的纠结》，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3 年，页 157—188、页 189—239；《论“回环”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见氏著：《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页 248—269。

性的诠释,固然有见于传统社会偏于“理一”,过于凝聚,缺少发散,而现代社会之开放多元的特征即直指向“分殊”的一面。然而,刘先生却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堕入一边,而当在此两极之中把持中道。“理一”乃是我们的终极向往,就此意义而言,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远景世界;然而,从实存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人却始终处于“分殊”状况之中。换言之,今日之哲学,不因“分殊”而不求“理一”,但亦不因为求“理一”而无视“分殊”。就最一般意义而言,将刘先生所说的“理一分殊”看作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大体不错,然而,若将此“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将“两行之理”、“回环”)仅仅视之作为一种方法,却不符合刘先生的思想实质,毋宁说,它同时也表现出刘先生的思想创造^①。事实上,刘先生对人之有限与无限的阐发,对超越内在、全球伦理、宗教对话等等课题的探究,似乎无一不可以看作是对“理一分殊”之哲学命题的开拓,但没有人会否认,刘先生正是藉由此类种种问题的探索,成就了其思想系统的丰富内涵,因此,“理一分殊”在刘先生的思想世界中不仅仅只是我们照察世界的方法,它同时也指向我们人类所面对的存在事实和客观境遇。要言之,刘先生一方面有鉴于现代生活的多元甚至相对主义的盛行,要求人们保持对超越的“理一”的祈向,另一方面,此超越的“理一”又非某种实质性的统一,而是类似于卡西尔(E. Cassirer)的“功能的统一性”,如是,即此超越的“理一”如何贯通和落实于“现代的特殊条件”亦复成了刘先生念兹在兹之所在;从理念层次上看,传统文化对于“理一”与“分殊”有相同的重视,但实际情况则是“传统过分偏重‘理一’——由上面直贯下来,不免造成了一种压抑的结果。现在则更重‘分殊’,也就是说‘理一’的表现

^① 刘先生的高足、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郑宗义教授在给笔者的来信中特别强调,将刘先生的上述三个概念仅仅了解为一种方法即有斩截过分、易生误解之嫌。宗义兄于是书之选编颇费心力,多有指点。

需要采取‘致曲’的方式，整个生命力的发挥始得更为顺畅”^①。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要多侧重对“分殊”的注重，乃可与现代化与多元文化相互接通与结合。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真切理解了“理一分殊”，我们又可以发现，此“理一”是一行，而“分殊”即是另一行，我们哲学中所常常说的主从、一多、同异、真俗等等也都是“两行”，此“两行”永远处于不断的回环之中，“由内在到超越，由超越到内在；由局部到全体，由全体到局部；由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由对立到统一，由统一到对立；由多到一，由一到多……不断回环，无穷无已，永不封闭，永远开放。《易经》的最大智慧就在这里，全部六十四卦，第六十三卦是既济，第六十四卦即是未济”^②。既济、未济构成了一个宇宙变化的普遍的回环。此类说法固可从方法论的角度视之，不过另一方面，此“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和“回环”的概念同时又是存有论的和价值学的概念，因为它不仅可以直通至超越理想与现实的动态紧张之中，而且其当下即给予我们启示，“我们不能最终脱离自己的有限性去把握别的东西。有限只能通于无限，但有限却永远不能同于无限。如果说有限同于无限，就是僭越，就是以偏概全，就是悖理的，就有逻辑矛盾；而逻辑上若有矛盾，存在上就不可能，就不能存在”^③。

① 刘述先：《大陆与海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页254。刘先生还举例说：“还有近年来有一个奇特倾向，也可作为‘理一分殊’的例证，就是 glocalization。Glocalization 是 globalization 与 localization 这两个单词的拼合，globalization 意为全球化，localization 意为本土化，所以 glocalization 的意思就是‘全球一本土化’。这种倾向表明当今世界正是在普遍性的‘理一’和特殊性的‘分殊’这两极之间移动。各个地方都在趋向全球化，同时又都在保持本土性；但虽然都在保持本土性，却又都在趋向全球化。”参见胡治洪：《南港烟春识真儒——刘述先先生访谈录》，载《鹅湖月刊》第三十四卷第10期，2009年。

② 参见胡治洪：《南港烟春识真儒——刘述先先生访谈录》，载《鹅湖月刊》第三十四卷第10期，2009年。

③ 同上。刘先生又云：“孤立的个人是渺小的，即使是社会群体，也仍然是有限的。但人一方面能够体现自己生命内部的价值，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另一方面又能参与天地之化，自己的生命虽有限，却可以通于无限，在未完成之中完成自己。”参见《“两行之理”与安身立命》，《刘述先自选集》，页371—372。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刘先生所揭橥的“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和“回环”三个概念,不仅标示着刘先生在儒学研究方面接着第二代新儒家而说的努力,而且事实上也构成了最能代表刘先生在思想开拓方面的创获和贡献,其间义理尚有待于学者作进一步的深思。

四

探究儒学的现代转化,或寻求儒学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乃是所有新儒家努力的共同方向。然而,正如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所表现的特征与现代化作为某种具体的文化成果所具有的特征之间并不可作等量齐观。我们今日寻求儒学的再兴或对传统儒家义理予以现代的转化,就决定其实践的可行性而言,似乎首先应当将作为整体特征的现代化(现代化之精神)纳入我们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传统儒家义理在现代条件下的可欲性(desirability)和可行性(practicability)。不过,如此立言,又不免给人以决定论的意味,它暗含着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今日寻求儒学再兴(如果可能)的历史乃隐隐约约地寄附在某种我们首先必须直面而又无法摆脱的、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天命”上面^①。不过,在理论上清醒地认清这一点,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历史的宿命,我们似乎有太多的理由来证明今日儒学所遭逢的困境本不在于我们忽略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而在于这一文化传统在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

^① 参阅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第五编《技术的追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